

## 因农而起、为农而聚

※ 蔡培慧、陈莹恩

作者蔡培慧为台湾农村阵线秘书长，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

### 一种“农”的认识论的反思与重建

关于台湾农村阵线的跨界参与，可以从2008年对于《农村再生条例》的抵抗与修正过程中，对于“农”的再思考之中谈起。当讲到“农村再生”，总要知道“到底要‘再生’什么？”在《农村再生条例》，农村被官方定位为都市人的后花园，立法要旨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即为：“要打造一个让都市人流连忘返的新农村”。农村在官方的想象中成了被观看的对象、一个旅游的地方；然而，乡民生活与粮食生产所在的状态被忽略了。吊诡的是，农村与农民在法案中却是缺席的，集结为台湾农村阵线的伙伴认为有必要打破农民与权力者间的资讯不对称，于是连结过往的社会脉络主动到各农村办理说明会，与农民讨论法案良窳，农阵大概主动办了17场，而各地方各团体所举办的场次则超过50场。经过密集缜密的讨论，农阵提出民间版的《农村再生条例》。也是在地方互动过程中，让参与在这波行动中的农阵朋友，反省资讯掌握是权力的工具，进行法案的攻防往往是知识份子语言与游戏，农民真实的声音在这之中却一直是被消音的，因而，农民现身与现声成为农阵工作的重要认识。



举行地方说明会的期间，一位种芭乐<sup>①</sup>的农民曾如此诉说：“这个条例就好像农村又黑又瘦，可是政府只想在我们脸上涂脂抹粉。”这样极富生命力的字眼，是农家在生活中操练的语言。另有农民提到：“任何法律都要避免农地的蚕食鲸吞。”“农村不是不需要建设，而是要‘基础建设’。”因为台湾以前主要是以水稻种植为主，所以灌溉和排放系统是同一个沟渠，然而现在大都是多样化农耕，加上农村常有小型工厂进驻，造成的污染，以及农药与化肥的使用，有必要将灌溉与排放设置分离的水道，才能减少农耕过程与农作物受到污染的风险。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农民经验，是根植在现实的基础的主张。在这个过程中——农阵成员——多数是离乡的知识份子，再次地面向农村，再次被农村所滋养，也使得对于《农村再生条例》以及之后与农村农业相关的法案，农阵的友朋总时时提醒自己要更为谨慎地面对不同的思维模式，在分析上在思维中，真正地贴近农民农村。

## 一方有难，八方来援

另外一个则是在“大埔事件”的行动连结。这是发生在台湾中北部的苗栗县，当地地方首长预计征收一块地给鸿海子公司群创公司设厂，原定25公顷、后扩大为28公顷的征收范围，县长最后裁定征收160几公顷，扩大征收的目的为开发住宅、炒作房地产投资，而非公益与必要。是以，被圈划在征收范围内的农民起身反抗，有人坚决

不愿妥协，县政府便于2010年6月9日的半夜，由200多名警察随行，开动20几台怪手<sup>②</sup>，直接将已结穗的稻田铲掉。此一事件召唤出许多受土地征收之苦的农民共同集结、声援。农阵与各地被征收的农民，共同发出“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决心，并多次到台北陈情，然而苗栗县长却再一次以怪手突袭，刻意将田里的泥土挖走，以了断农民的盼望：田土都挖走了，如何再耕种。如此以公权力侵害基层人民的生产工具与生存权的政府，引发台湾各界的愤慨，为了将这股力量凝聚为更具政治力度的抵抗，农阵便于同年的7月17日在台湾权力中心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土地正义！圈地恶法，立即停止”的抵抗行动，当天参与其中，夜宿凯道的，除了上千位农民，也包括了许多的学生与都市家庭，出乎意料的，人民自主参与抗争或声援的人数共约3,000多人。

这场夜宿行动的凌晨，从南部运送一批批的秧苗，众人同心协力铺设于凯道广场的水泥地上，以青翠秧苗与劳动弯腰，提醒政府人民团结的意义，在呼喊著把田种回去的同时，凯达格兰大道冰冷的水泥，由人民协力“铺”上一方青翠秧苗，象征农民力量生生不息。当农民铺秧苗时，自然的以手势轻佛秧苗、顺手抖落露水滋润地土，即使在高度张力的凯道，农民的身体节奏仍印证了“农”

作为一种身体技艺，是农文化的深刻内涵，是透过生活与身体实践所体现的，而也正是知识分子的言语文字系统的知识系统、工业的技术和操作原则之外，另外一套伴著身体劳动经验而超越于语言技术之外的知识/技艺层次，这是农耕与小农文化的生命力。抗争行动中，众人从凯道上铺秧苗，之后将秧苗送至高雄美浓种植，历经120天后的生命循环，待稻谷长成饱满而垂首的稻穗后，再订于预订收割的同年11月14日，农阵与各地受土地征收之苦的农民，集结于美浓，在稻浪中穿梭，以几乎难以复见的手工割稻，在田地上割出了“土地正义”四字。这场极具意义的行动，有力地政府宣示：“没有错，我们的田被强权给铲了，然而，我们可以扶起稻穗，我们可以把田种回去！”

## “破”“立”同行

秧苗都长成了稻谷了，但法律的修订却不见显著的改进，与此同时，农阵成员提出了民间版的《土地征收条例》，并于同年11月12日面见最高行政负责人吴敦义，要求加速修法。即使面对牛步的政府，农阵以及各地关心台湾农村的朋友从未被动地等待，而是开展一连串的行动，希望藉由各种形式的表达或作为，彰显农村、农耕与小

农文化的价值，农阵认为关于农意识型态的辩论正在发生。无论《农村再生条例》或“大埔事件”，均非单一法案或案例，而是一个总体发展方向和体制结构的问题，换言之，台湾的政治体制已往财团倾斜，台湾的社会认知正窄化为利润取向消费主义。在这个认知基础上，农阵思考介入体制及松动结构的可能，并试图开展出农村行动美学。透过组织性的行动，集聚各地农民组成捍卫农乡联盟，也藉由营队及各种形式与内容的讨论，深化认识的基础，包括连结国际组织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的经验。此外，“小农复耕”的在地行动、“弯腰生活节”的平台，试图在“破”的抵抗，也长出“立”的积极作为，使“农”的价值并非只是在论述文字中发生/声，而是化为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实践，透过食物与餐桌，重建食物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所有人、农村、土地、农民的连结，加强农民耕作与食物消费的互动，以及拓展小农生产与环境脉络依存的讨论。或许，在城市里头举办农民市集，同时也是一场软性的“占领行动”，农耕与农民的软性“占领”意味著“现身”，当“农”的劳动化身为“食物”具现在常民生活空间、当“农民”以具体形象出现在城市居民与消费者眼前，那个论述中的抽象概念或城市人对于“农”的浪漫想象，进一步的有了现实的牵引，因而有了互相看见和真实理解的机会，所谓“城乡共好”及“绿色消费”<sup>③</sup>，一点一滴扎下深根/耕的可能。

## 走向真实的“城乡共好”

社区支持型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便是摸索“城乡共好”如何可能的其中一种概念与实践方案，而在不同的社会脉络与对于词汇的定义，也将长出不同的尝试路径。对台湾农村阵线而言，作为一个因社会运动而起、汇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的组织 (或群体)，“社区”在哪里？也许从“Community”进行定义上的思索，从具体空间上的“社区”、到较为抽象范畴的“社群”都在其中。以农阵的经验而言，它意味的“一群人”的聚集，而这“一群人”是怎样的状态？怎样的人群组成，它不一定是在空间上的紧密连结，也可能是象征性的、在意识上对“农”有共同认可而群聚的人们，那是一个开放的、相互对话的、看见彼此的关系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往前走、保有动能进行改变，是必要的，于此同时，我们也在路程中持续反省自己的社会位置、和思考农村与农民之于己的意义，而“CSA”的“Agriculture”需要超越的诠释。总而言之，“CSA”即“一群人与农的关系”。“农”有几个层次，从生产以供应多样化的食物，以及连系这种生产队伍的农村社会，而架构在农村社会背后的文明系统正是小农文化的底。若说华人文化的文明可从“农文明”回溯起，应该不过。在历史进程中，西方的文明或城市文明，创造了文明间的阶序，使“农文明”被侵扰与藐视，让我们变得不太

有自信。然而，“不太有自信”也不见得是件坏事，也许人不需要有太绝对的自信，因为一点点不那么的自信，在迟疑彷徨中仍维持著前进的步伐，大概反思才可能发生，有所反思或许能让这条路走的深、走的远、走的扎实、走的谦卑。

此际，或许是时机更进一步探寻与建构“CSA”的想象。在2011年，农阵有许多朋友参与《种好菜，过好生活：社区协力农业完全指导手册》(Sharing the Harvest) 的翻译工作。“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是本书原作者美国Elizabeth Henderson与朋友使用的词汇，是经历过一番讨论 (或辩论) 才拍板定案。在华人语境与台湾社会，如何翻译才能够最贴近台湾的脉络，也最贴近台湾的小农文化、农耕与产业模式，在这些基础之上开展最合宜且最开放的想象框架，而非仅是创造另一个西方的典范 (paradigm)？高雄旗美社大的张正扬与我们多番讨论，便提出了“社区协力农业”的建议。早于美国的“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日本已有“提携”的概念与实践模式，两者都是将空间上的“社区”与“农业”，透过食物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串起关系，在“提携” (Teikei) 系统便意味著“相互帮忙”的关系，若转换到中文的语汇，“协力”应涵盖了最完整的意义，强调动态互动而信任的关系，也避免在尝试新的实践方式的过程，再制了农/工、城/乡的二元分立。农工城乡、

生产者与消费者，都是相对的、互为主体的关系，并无谁较为高位，或“我来支持你，帮你站起来”的意涵，因此翻译小组当时并没有选用“社区支持型农业”作为译文。更进一步而言，“社区协力农业”有这样的想象：这是一群人为土地、为“农”而建立起的友善连结网络，因为彼此相互看见对土地与农的关注与心力，且亲身参与到食物生产的农耕过程，而长出较为整体的、全观的视野，人们得以渐进地意识到：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和大环境里的其他人和事物相互嵌合，于此，对于他人与土地的关照，才有可能萌芽。

## 在倾斜的天秤上扶稻

农阵在自2008至2011年以来开展的工作和社群/区连结，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实践与抵抗行动，并不是农阵的功劳，而是受惠于台湾长期的在地行动与社会基础，这些支持始于近年来台湾社会开始开展对发展主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物质主义的反省与思辩。因为工商发展为主的经济模式，我们得到便利、效率的生产与多样性的消费选择，但所有“得到”的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把现有的土地、生态环境、地方文化、底层人民的劳动力或生存尊严给交换出去，而将这些存续的基础让渡出去的，除了财团，也包括渐渐与财团连成一气的政府。也

许经济仍持续发展，但是大多数的资本却不再与付出劳动力的人民共享，而进入钱滚钱的投机市场，人民承担的，是资本主义扩张与工业密集发展带来的各种环境效应，包括2008年带给台湾极遽影响的莫拉克风灾，而这仍只是冰山一角。除了这些反思，1994年的社区总体营造<sup>④</sup>及同时期发展的社区大学<sup>⑤</sup>，使得台湾打开许多讨论公共议题的空间，如果没有这十年，相对而言较缓慢、稳定的地方力量的革命，公共议题的讨论或许不会如此快速扩散到地方。

## 在一条荆棘路上的并肩缓行

农阵的跨界参与，以及聚集了许多有志青年的连结和实践，能够发生且持续下去的原因，大概可归出下列几个原因（尽管农阵仍然是一个初生的行动团体，它的走向也还有许多可能，此时所写下的，或许也是对往后工作进程的时时提醒）：其一，“学习”是持续不断的进行，而“学习方法”是推著自己和团体做具体的议题分析，行动必须有强韧的论述作为基础，如此才走得稳当与扎实。另一个则是“劳动”，劳动之于农阵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大多已然离农太远的青年人，这个“劳动”特别指的是农耕过程的劳动，是透过身体技艺的拟仿、或实作，进而可能更为贴近农民与农村的方法，因为劳动而习得“能屈能伸”的姿态与心态，农耕之于大多是学生的青年人而言，有这么一个自省与自我砥砺的意义。再

者，“脉络”是重要的，谈论“脉络”意味著一种关照整体的思维，以农作而言，农耕过程需要考量的太繁复，那是一门细致的认识与知识系统，且并非抽象的思考范畴，而是与自然环境的紧密互动的关系与观察，那同时也是长期的农作与生命的累积，台湾小农文化的“敬天敬地”，即是关照整体、重视脉络的人观与自然观，这或许是工业文明的绝对自信、城市文明的人我疏离，所需要作为参照的一种生活与生命态度。第三，则是看重“运动队伍的再生产”，农阵每年连结各地农民的具体抗争行动，针对青年再认识农村的夏耘，以及鼓舞青年进乡落户的支持，都是为了建立一批批自主开展的农村工作的可能性。最后则是“在实作中摸索更好的行动”，在农阵社群的讨论与意见，往往有机会落实为具体的分工，在开放的人群空间，各种想法与行动的点子都可以丢出来，而提出点子，找到伙伴就要去执行，因为人是在行动中琢磨的，琢磨组织的可能，也探讨合宜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磨练心性，如何让事情能够完备谨慎地被完成。很多事情因而开展，不疾不徐的，透过这些行动，农阵尝试去重探“农”的价值、实践“城乡共好”。

这些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宣称，而在于朝著某种方向前进，个别工作的路径未必一致，深耕的脚步或急或迟，只要持续的走，或许也能与鲁迅所言相映之：“其实地上本是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❶ 又称番石榴。

❷ 即挖土机。

❸ 参考附录二：“绿色消费”。

❹ 参考附录二：“社区营造和社区大学”。

❺ 参考附录二：“社区营造和社区大学”。